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三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九八期 ——  
（二〇〇四年十月五日报版）

---

本期目录 （zk0410b）

【当事者言】1966年的北京市委	吴 德
【历史文献】在天安门上的两次讲话	林 彪
【大字报选】“高干俱乐部”是修正主义的安乐窝	
触目惊心的高薪阶层	
高干子女的特权思想与资本主义复辟	向东辉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当事者言】

1966年的北京市委

• 吴 德 •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

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市工作的决定。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

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时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到宋任穷时，提出能否不去北京？

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

我又问：北京的情况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

我追问：彭真出了什么事？宋任穷说：你到北京后由中央同你谈。任穷同志不愿多谈。

我在沈阳待了几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时，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毛泽东时在外地，刘少奇主持。就在23日那天，中央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彭真还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他们的问题由所谓“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上升到了“反党集团”。

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

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与我谈。

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临近尾声。我听了最后两三天的会议，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的讲话。他们都是着重讲毛泽东思想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因为前一段的会议我没有参加，许多事情不接气，听不懂。这时彭真同志已经不参加会议了。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

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

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参加了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会议上的情况他没有给我传达，在与我谈话时，只对我说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担负起北京市的工作的。

北京市委5月下旬改组，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

新市委的名单于1966年6月4日公布。3日，周总理告诉我说名单要在报纸上刊载。

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时间只有七个半月。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1月18日，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市委被夺权后，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人被关在东交民巷14号，学生和造反的工人在近处监视我们，大院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守卫着。以后，我们又被弄到工厂去了，然后又被揪回来。

李雪峰主持市委工作不到两个多月，华北局里就有人开始造反揪他了。我记得好像是在一次检阅时，毛主席对李雪峰说：避一避，避到内蒙古或天津，一方面照顾当地的工作，另一方面还可以指导北京市的工作。

李雪峰后来到了天津，开始我们还可以通话，但后来，我们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

北京市派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资反路线”错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我记得当时华北局正在开会，李雪峰让我参加了会议。会议好像是解决内蒙古乌兰夫同志的问题，还有天津、河北的一些问题。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给老师提意见，对老师进行大批判，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学校由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碎。北大大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就跟着乱了。

我们当时认为，学校的党委一瘫痪，整个运动将无人领导、无法领导。我们每隔一两天就到怀仁堂去参加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情况汇报会。大家都觉得必须马上改变这种状况。

针对学校混乱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要新市委提出关于中学、大学的工作纲要，并指定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搞中学的纲要，北京市委搞大学的纲要。

工作纲要搞好后，我们向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汇报。刘少奇说中学的纲要可以了，大学的还需要修改。在汇报会上，李雪峰提出了如何解决目前学校领导瘫痪、学校无人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市委可以派工作组。陈伯达后来反对派工作组，其实他是最早派工作组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

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了解情况、领导运动。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将决定报告了毛主席并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北大工作组的组长是张承先，清华工作组的组长是叶林。后来，为了解运动情况，刘少奇还派了王光美参加清华的工作组。我和李雪峰商量后决定工作组的组员从“四清”工作队中抽调，中央各部委的各地院校由中央各部委派人组成工作组进驻。

工作组进驻后，局势稳定了一些。

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6月18日，北大的聂元梓写大字报反对八条指示，并揪斗了校领导陆平、彭云和著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工作组针对搞“打鬼台”和乱揪乱斗的现象予以制止，张承先为此写了一份简报，市委将简报上送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正确，将简报批发全国。刘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来了，他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看见这个口号，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怎么能打倒呢？我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

当时，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两军对垒，形势很紧张，这一边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造反，另一边是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控制局势。

根据这些情况，李雪峰在华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有关运动的情况和抓“游鱼”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出“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说一个游鱼能掀起三个浪啊！“抓游鱼、反干扰”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多天。

7月1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李雪峰、吴德、胡克实关于北京情况的汇报。江青也来参加了，她是后到的，坐在一个角落里。李雪峰汇报说各学校行政组织都已瘫痪，不派工作组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了。陈伯达一反常态，表示反对派工作组，邓小平当场站起来与陈伯达争论起来。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要派工作组。我也认为不派工作组无法领导运动，“四清”运动不也是派了工作组吗？人民日报社就是由中央派了工作组的。

7月23日，毛主席在钓鱼台听李雪峰和我的汇报，陶铸、康生等人参加了，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李雪峰先是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的情况，我们看到毛主席很不耐烦。李雪峰转到汇报北京的情况。毛主席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像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批，怎么改？群众写对联讲“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赞）你们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学校里广大师生。

毛主席指责我们说：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毛主席决定马上撤销工作组，要我们执行。毛主席批评得很厉害，提到很高的高度，说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了群众。

在回来的路上，我与李雪峰在车上商量了一下，我们前几天刚传达了派工作组的决定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现在又传达毛主席相反的指示，怎么向群众解释呢？怎样才能把工作组撤出来呢？以后的运动又怎么来领导呢？李雪峰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他说上次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是你传达的，这次传达还由你来讲。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操纵，派到学校去的各个工作组没能撤出来，遭到了揪斗。

在一次中央召集的汇报会议上，毛主席和林彪都参加了，李雪峰不在，好像到天津去了。我提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下发了，但是工作组撤不出来，工作组的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问题责任在我们，他们的问题回到本单位解决为好。

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点头表示了同意。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仍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工作组一直到新市委在第二年“一月风暴”中

被夺权后，才撤出来。那时，工作组也开始造我们的反，揪斗我们。我在被揪斗时对他们说：我们已经被夺权了，你们赶快回本单位吧。

1966年7月28日，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这以后，我感到没有办法领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周总理说中央各部委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

周总理指定我为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陶鲁笏为副主任。委员有孔原（调查部）、丁国钰、李清泉（外交部），吴星峰（石油部）调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各部各口负责接待相应的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员的事情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批评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错误，要立即撤销。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重新发动群众，要李雪峰和我以及清华工作组的组长叶林进行检讨。江青、康生亲自到北大、北师大煽风点火。毛主席还派周总理到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宣布给蒯大富平反。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由李雪峰主持，宣读了市委28日《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刘少奇说：“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前出来了一下。

粉碎“四人帮”后，李雪峰告诉我，在这次大会之前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斗争很尖锐，毛主席讲话的基本内容就是后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刘少奇在检讨时说：共产党员能上能下，动荡的北京市委我也可以下去。毛主席说：你可以稍稍下去一点点，不要下去那么多。

人民大会堂大会后，新市委负责人开始多次在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以及在各个大学的大会上检讨执行了“资反路线”的错误。我和李雪峰检讨了不下十次。

说几个当时的情节。有一次李雪峰在北大作检讨，我和刘建勋（刚从河南调来的北京市委书记）在场。检讨大会由聂元梓主持，大会开始后，聂元梓对我说外边有人要把李雪峰揪走。我说不行，我们一方面是检讨错误，一方面是支持你们，你们应该派纠察队保护嘛。

结果聂元梓根本未作任何保护，而是勾结从事，李雪峰检讨完了，没有上车就被一些人架跑了。

我很生气地对聂元梓说：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你要负责设法找回来。我知道这伙人是受聂元梓指使的。

聂元梓一句话回答我说，她没有办法。

刘建勋见事，着了急，坐车风驰电掣般跟着揪走李雪峰的那伙人到了政法学院。结果他也被揪到一个会上挨了斗。

我回来后，将情况紧急报告周总理。过了一晚，周总理派周荣鑫去政法学院才把李雪峰和刘建勋要回来。

接着，北京工学院贴大字报，限时要我去检讨“资反路线”错误。我检讨完后，学生们一下把我的稿子抢走了，还把我扣住批斗了好几天。

北京工学院还没放我回去，我又被一批从吉林来的造反派蒙上眼睛，架到汽车上拉走了。

吉林来的造反派在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审问了我一次，还把我拉到火车站，说要押送我回吉林接受批判。到车站后，因为火车不通，才没有走成。

他们关我的地方没有床，睡觉只能躺在地板上。我记得我的房子门内放着一个大铁哑铃，有一个人昼夜监视着我。到了夜晚，我提出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们怕我自杀，抢走了我的安眠药。

这些揪我的人有些是地质部系统的，地质学院的，他们坐的汽车是地质部的。

我对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说：我在吉林工作了11年，我请求过周总理是否要回吉林交代清楚，周总理说中央不同意。现在你们没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我不能去吉林。

半夜，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要我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周总理接见他们，但不讲我现在被关押的地址。

我马上给住在京西宾馆的刘建勋打电话，说明吉林的造反派要通过我找周总理，请刘建勋转告周总理。打完电话后，我对造反派说，我已把电话打给周总理的秘书了。那些造反派将信将疑。

第二天，这些人又让我打电话。我提出，找总理的秘书，你们不告诉我地址和电话，就是总理知道了，又怎么能找到你们。吉林这些人只好同意告诉我被关押的地点和电话。这时我才知道，我被关在电影学院的四楼里。

我又把电话打给刘建勋，告诉了我的情况及他们的要求。当时，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还怀疑我是否真正把电话打给周总理的秘书了，他们问我是不是周总理的秘书在接电话，我说是。

刘建勋找到周总理，汇报了情况。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焦玉山打电话找吉林造反派的头头说，立即释放吴德。焦玉山还在电话中批评他们这样搞是错误的。

电话打完后，吉林的人告诉我说，刚才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要听，立即放我出去。他们还问我中央文革办事组是不是有焦玉山这个人，怎么找这个人等问题。

我说中央文革小组有这个人，可以到钓鱼台去找。我打电话给市委，他们派车来把我接走了。以后我才知道，周总理很关心我的下落，以为我被关在天津了，曾派陈一夫同志坐汽车追到天津找过我。

再讲几件事情说明当时的混乱状况。天津矿冶学院的院长吴子牧调到北京市委大学部任部长，他在矿冶学院几乎被打死，吴子牧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吊自杀了。吴子牧在

被打时，幸好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吴星峰赶到了，吴星峰扑在吴子牧的身上说：我是市委大学委员会派来的，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这样才把吴子牧保护下来。

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北京市委说话没有人听。张霖之在矿冶学院被打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造反，彭小蒙后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回答可不可以成立红卫兵的问题时，被台下起哄打断。当天，我们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检讨，江青、陈伯达等人都在，彭小蒙来到会场对江青等人说有人不让她讲话。江青当时就说，你们市委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人讲话。我说我去看一看吧。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和我去的。

当时，市委里驻进了一百多个联络站，秩序极为混乱，市委根本不能办公，只好搬到北京饭店、椿树胡同，又转到京西宾馆去临时办公。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指责我们是地下市委，怕见群众，要我们回市委去办公。刘建勋说中央批评我们了，我们应该回去。我说不能回去，动荡的北京市委回去就出不来了。刘建勋提出他回去试一试，结果，刘建勋被包围批斗了一日一夜，还被迫在给造反组织提供经费的报告上签了字才被放出来。此事中央文革批评市委犯了经济主义错误，收买造反派以保自己。

那时市委基本上是瘫痪的，先是学生然后是工人造反，是京西煤矿的李思聪带的头，他好像是“革造”这一派的，后来做了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工人造反成立了造反组织，他们在长安大戏院把高扬文找去，谈了一天还不让回来。我在人民大会堂将高扬文被扣的事报告了周总理，我说高扬文的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可否换一个人去。刘建勋说 he 可以去，总理同意了。结果，刘建勋一去不返，也被扣住了。周总理派周荣鑫去现场了解情况后才知道，造反派是要逼市委承认他们的造反组织。

我记得我在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高扬文的情况时，有报告说有人正在冲击国防部。周总理、叶帅、陈伯达都在场，还有几位老师也在场。情势严重，不容拖延，周总理叫张春桥、戚本禹等去国防部制止冲击。张春桥回来时洋洋得意，对几位老师说：群众都是很讲道理的啊！是革命的，一讲就撤走了。潜台词是说，为什么你们几位老师说了就不行呢？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搞乱天下，然后从乱中显示治乱者非他们莫属，妄图实现他们篡党篡政的阴谋，如此而已！

□ 本文为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一书第一章“动荡的北京市委”（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

## 【历史文献】

在天安门上的两次讲话

• 林彪 •

◇ 1966年8月18日

同志们，同学们：

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

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让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

要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就能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最近中央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订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我们一定要坚决按照这个决定办事，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要坚定地依靠革命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右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是个长期的任务。这中间有大战役，有小战役，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要一直打到底！

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 ※ ※ ※

◇ 1966年9月15日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为了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来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问好！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以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十六条为指南，正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地向前发展。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狽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目标是共同的，方向是一致的。

大家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携手前进！

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从来就是我国革命的主力军。今天，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我们工农兵群众，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守生产岗位，坚守战斗岗位。要坚决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做他们的强大后盾。

红卫兵和一切革命青少年，是我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你们要向工农兵学习。学习他们最坚定的革命立场，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一切优良品质。要像工农兵那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切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大字报选】

### “高干俱乐部”是修正主义的安乐窝

作者前记：《体育战线》第五期曾刊登了“揭发邓小平搞‘裴多菲’俱乐部的黑幕”一文，揭发了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最近，我们又了解了有关该“俱乐部”修建过程和改成所谓“业余体校”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是揭发邓小平等所搞的这个“高干俱乐部”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安乐窝。

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五八年，他放风说：“他到过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为党内活动的俱乐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场合

才好。”看，邓小平对那些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臭货，是多么羡慕！此话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听到后，正中他的黑心，便说：“我们北京也需要有一个为中央服务的地方。”就这样，他们私下决定要修一个专供他们一伙吃喝玩乐的场所。

当时，彭真把任务交给了他的爪牙刘仁和万里。于是，刘仁和万里就打着“为中央服务”的牌子，四处寻找风景优美、环境雅静、路程不远、易于保卫的地方。最后，他们选中了工农兵公园（原北海公园）西岸附近。前北京市委在邓、彭的指使下，盗用国家资材，以飞快的速度修成了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这里，一进门是宽阔的停车场，接着有八个四合院，共一百多间房，包括休息室、游艺室、台球室、打牌房、客房、餐厅、小卖部、洗澡间等等，名堂很多。后面，是一个公园式的人工湖，水中有走廊、亭子，四岸有钓鱼台，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及各种花草树木。此外还特地修了露天舞池。修好后，又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高级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甚至还有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一切齐备，当年即敲锣开张。

这个作为特殊供应点的地方，吃什么有什么，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应俱全。遇到重大节日，白吃白喝，有的“高干”还连吃带拿。凡是能到这里来的，都能喝到龙井茶，吸到熊猫烟。邓小平到这里打牌时，要吃一顿价值四块钱的夜宵！而他自己却只掏一块钱，其它三块钱是通过各种门路让国家给他报销。他坐高级沙发嫌不舒服，还非要再垫上软垫。看他“修”到何种程度！前市委公安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基平、邢相生等吃山珍海味吃腻了，忽然想起要吃狗肉，于是便派人去延庆打狗。农民不让打，他们就欺骗农民，说医院里需要狗作试验。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的“高干”打球到深夜一、二点钟，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服务员还得给他们脱衣服、脱袜子，以便于他洗澡。这里，每周举办两次舞会，邓小平等人的舞伴是从文工团和各大医院特邀来的所谓“标致人物”。这里演的电影，净是西方和香港的片子。不管是跳舞，打麻将，还是打桥牌，都是玩到深夜，甚至通宵。这里散发着发霉的修正主义气味。这种臭气，招来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经常到这里来的除了邓小平、彭真、刘仁、万里、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外，还有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蒋南翔、刘志坚、周扬、夏衍、荣高棠等黑货。

不到一年，这个安乐窝就容纳不下这些来客了。邓小平对于夏天在屋里打牌没有冷风，也很不满意。于是，他与彭真偷偷地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他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08”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大的工程，是前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的，所以，就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以及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招摇，他们不但搞建筑材料、设备，甚至连南方的竹子也运来了。正在他们拚命修建时，中央指示停止一切非建设性的工程，周总理并亲自点名要“08”工程“下马”。这给邓小平、彭真等当头一棒！但是，这些家伙并不死心，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耍两面派，表面上停工，暗地里施工，邓、彭通过万里，把工人调进室内偷偷地干活。他们怕中央知道内幕，便指示把玻璃涂上白灰，干活时不许出声。后来，周总理又三翻五次地催“08”工程“下马”。邓、彭仍然对抗，把三座楼合成一座楼，继续“地下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得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1000万元，至今尚未完工。工人们对于这里的浪费很痛心，他们说：“我们盖了许多大楼，从来没见过像‘08’工程这样浪费的！”“这里有三大：门大、窗大、浪费大！”

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大楼，建筑华丽，十分奇特。四层楼房下有地下室，上有凉台。楼内包括游泳池、网球房、地球房、台球房、乒乓球室、羽毛球室、围棋室、电动游艺室、打靶场、跳舞厅、餐厅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如游泳池，宽敞的室内游泳池一端水深达4.50米，可跳水。还特为高干的小孩设有小游泳池。游泳池南侧，有一个半园型的大

厅，专供日光浴。这个游泳池最特别的地方是池底与地面不接，而是悬空的。据说，这是为了防震。在修这个游泳池时，邓小平和彭真等耍了鬼计，他们说修游泳池是为了毛主席游泳方便。实际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本没到这里游过泳，而是他们经常在水里扑腾。再如，光跳舞的地方这里就有四处，包括露天舞池，平台舞池和室内舞厅等，舞厅悬挂着奇形万状的大吊灯。还有，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50米的打靶场，四周都是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一般房间，有部长级的房间，有彭真、罗瑞卿等专用房间，邓小平是相当大的，光水电费每月就要开支5000多元，招待费是实报实销。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于六月底停止开放。周荣鑫通知体委接管西院大楼，一方面办“业余体校”，一方面继续向“高干”开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接手后，大耍阴谋，提出要：接管快、清点快、开放快。并于七月底急忙停止该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新开门、修道，挂出了“XXXX业余体育学校”的牌子，定于八月一日“开学”。但是，这个“业余体校”并没有学生，更没有教师。而是继续过去的开放活动。就在八月一日开学这一天，接待的是邓小平来“学校”打牌、洗澡、修脚！荣高棠所谓的“学生”，是“专招高干子弟”。不过当时这也是一句空话，实际上仍然是邓小平等一些“高干”在那里活动。我们从国家体委七月底发出的“关于XXXX体育学校自八月一日起开放的通知”中，可以看出这个“体校”是怎么回事。通知中说：“开放对象，除业余体校学生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内X长和军队党内X级X长以上干部可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荣高棠是打着“业余体校”的招牌，欺骗中央，欺骗革命群众，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货色。后来，国务院财办和外办等单位的革命派一针见血的给这个“业余体校”贴了大字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业余体校”才上面得不停止开放。

目前，在“业余体校”工作的革命派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正在积极揭发邓小平、彭真等在这里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

□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惊雷》战斗队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体育战线》1967年3月11日）

※ ※ ※ ※ ※ ※

### 触目惊心的高薪阶层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过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转引毛主席的指示

#### ◇ 前言

中国的赫鲁雪夫刘少奇，长期以来窃踞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打着“红旗”反红旗，干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他的黑手伸得很长很长，伸向了党、政、财、文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之中。就是在这个人民公敌的黑手掩盖下，在中国培植了一个高薪阶层，作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

为了彻底揭发和批判刘少奇这个中国的最大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肃清其恶劣影响，现把劳动部《革命战斗队联合造反团反阻力第一战斗队》揭发高薪阶层的材材

摘抄如下，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和革命的同志们揭发批判时参考。

#### ◇ 高薪阶层的情况

资本家：1964年底，我们对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济南五个城市的资本家进行了调查，拿高工资的约两万四千多人（其中三百元以上的一千二百四十多人）。他们有当中央各部部长、付部长、付省长、付市长的，有当收发、营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企业担任经理、厂长、科长、工程师和一般职员，他们的工资绝大多数远远高过所任同等职务的职工的工资。请看：

江苏省付省长刘国钧（原是常州市私营大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月工资1,000元，省人委还车马费200元。

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工资1,676元，这个厂的一个财务科长月工资825元。

上海万里造漆厂作一般职员工作的张志坚，月工资538元。

上海九华袜厂当收发的邱显章，月工资374元。

常州市大成工厂当看门的朱尔杰，月工资320元。

不合理的保留工资：1964年我们对上海、浙江、江苏常州市一部分企业160多万职工的调查，有保留工资的约十四万人。这十四万人中，一般职工保留10—20元的工资，而旧技术人员、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亲信，他们的工资保留的很多，有些人实领工资超过了他们应得工资标准的几倍。一个办事员，工资竟达500元—300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0元以上。请看：

上海静安区房产公司24级的办事员杨格（原在外商单位工作）标准工资49元，可是他却拿400元，保留工资351元，等于他应得标准工资的七倍多。

上海电业局一个会计，标准工资94元，实领工资655元，保留工资561元，等于他标准工资的六倍。

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在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他们的工资超过国家规定同类人员的最高工资，有的达一倍以上。如医务人员，就以北京地区为例，规定是高标准工资333.5元，但有些医师月工资实领600多元。

文艺人员：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像。一些大演“名”、“洋”、“古”，“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主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吹鼓手。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一般是500—600元，甚至高达1,000元以上。请看：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请看：

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十六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1953年，他们的工资最低351元，最高达950元。

高稿酬，高报酬：文艺人员中的一部分人，除领取高工资外，还拿着高稿酬、高报酬等高额收入。如作家写文章、写书有稿费，出版后，有“版税”；把他写的书编成剧本，演出时，还要再提取演出费；演员拍电影、电台录音、灌唱片等等均另有报酬。请着下面几个骇人听闻的事实。

京剧演员李少春，月工资1,000元，拍了电影《野猪林》后，又得酬金3,000元。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录音三小时，得酬金3000元。

京剧演员张君秋，月工资1,450元，录制《诗文会》选段，仅三十分钟，得酬金600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到底千万不要忘什么？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7,000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不要打野鸭子搞“外块”的作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剥削“合法化”：文艺人员的高薪、高稿酬、高报酬是在人民公敌刘少奇指使下，由其死党陆定一、周扬等长期盘踞的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搞起来的，使这些人剥削“合法化”，如1964年12月旧文化部发给几个制片厂的《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中规定：名作家的稿费，每千字为10—15元，青年作家6—8元，（诗每二十行算一千字）。电影剧本的稿费：长故事片2,000—6,000元；短故事片1,000—3,000元。音乐作曲：长故事片300—800元；短故事片150—400元。歌词每首50—100元。导演成功每个影片，酬金500—1,500元（长故事片）或300—700元（短故事片）。

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上述高薪阶层人员中，经济上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政治上也享受着各种特权，有的是各级人民代表，有的是各级政协委员、青年联合会委员等等。窃取这些名誉，在其反革命修正主义主子的保护下，胡作非为，干了不少坏事。

人数虽少，毒害极大：高薪阶层人数很少，在全国范围内为数有限，在职工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但这个阶层对劳动人民的腐蚀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极大，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置之不理。请看他们在干什么：

#### ◇ 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

散布资产阶级毒素：据我们1964年对几个地区的调查，拿着高工资的，不少人银行存款在万元以上，有的存款在30万元以上。他们有的是钱，放肆宣扬个人享乐，公开散布：“吃和穿最实惠，活着不吃好、穿好、玩好，还有什么意思。”

买房、盖房、当房产主，十几年来他们买房子、盖房子的很多。常州市140名高工资的技术人员和职员中，买房、盖房的占47%。如市纺织局一工程师（工资485元，其中保留工资224元）1964年花一万元造楼房一幢。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人（工资179元，其中保留工资70元）用7,000元买了一幢房子，然后又出租，当房产主。

三口之家顾两个保姆：上海、天津有的高级医师、工程师家里只有两三口人，却用着两三个保姆。

一声“爸爸”，送礼千元：常州大成纺织三厂一个工程师（工资402元，其中保留工资2

76元)暂时困难时期,他却三天两头吃一只鸡,他不惜花100元买两只鸡吃。1962年他儿子结婚,儿媳妇叫他一声“爸爸”,给见面礼1,000元。

结婚送礼一万元:上海市第六医院一个高级医师,他妹妹结婚,他送礼竟花了一万元。

七、八十元一瓶香水:上海京剧院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他的老婆用的是七、八十元一瓶的香水。

与猴同居:天津市京剧团女演员丁至云(月资650元),吃、穿一贯奢华。1960年,六口之家吃一顿肉就花100多元,8元一斤的花生一次就买200元的。四元一斤的螃蟹,一买就是二十斤。夏天他怕长痱子,花700元买了两个海绵床垫,夜里替换着睡。1962年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她花了200元买了一只小猴,给猴缝了衣服、枕头,每天喂猴吃香蕉、饼干、枣、肉等,还亲自给猴洗澡、理毛,晚上还跟猴睡在一起,并教猴说话、表演等。至于她生活上的淫乱,更是丑不堪言了。

喂狗养猫:天津市京剧团演员周啸天,月工资750元,两个老婆,养两只狗一只猫,困难时期都是喂细粮、猪肝、鸡蛋、牛奶,还带狗去理发馆去剪毛。

流氓成性,反共老手:天津市京剧团付团长厉慧良,月工资950元,是一个随意奸污妇女,道德败坏,极端反动的坏家伙。他平时散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他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恶毒攻击我们党,抗拒党的领导。他在学习反修问题时叫嚷:“我看高薪、住洋房、坐汽车、养哈叭狗没什么”。

#### ◇ 高薪阶层对工人阶级队伍的腐蚀

小恩小惠拉拢腐蚀:上海有一个厂的资本家用五千元外币买了一辆小汽车,每天上下班坐汽车,仍然威风挺大。他工资600多元,还在群众中公然说:“这点钱不够我太太的交际费。”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借钱给工人用,送糖给工人吃。还有些私方人员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工人。如给职工调换公债、借钱、送粮票,甚至通过请客送礼等卑鄙手段以达到腐蚀职工,潜移默化“和平演变”的目的。

和平共处,同流合污:天津永利久大沽厂科长以上干部143人,有保留工资的130人中,党员占87%。党委、厂长、工会主席十人中,八名有保留工资。这几名领导干部都是解放初期派到这个厂担负改造旧企业的任务的。由于资本家玩弄花招、耍手段,对他们拉拢腐蚀,提高他们的工资,1956年工资改革时,他们都生成了保留工资。可是这些领导干部拿着保留工资却满不在乎,还说什么“公私合营初期,厂里定了高工资标准,我们这些人谁辛苦为谁忙啊!不拿白不拿。”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拿着不合理的保留工资,实际上在进行剥削,不以为耻,却感到心安理得。1964年厂里开展“五反”运动,广大群众贴大字报要求取消保留工资,这些领导人仍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有些人长期与资本家和平共处,划不清阶级界限。解放前这个厂的一个封建把头兼资本家叫沈华人的,这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分子;解放后职务逐步上升,当了工程师。1956年工资改革时,工资定为144元,他有保留工资,实得228元。他年过60岁,厂里又给他外加30%的在职养老补助费。住处离厂没一公里,上下班要汽车接送。1962年该厂党政领导还为他庆祝七十大寿,还在天津日报头版登了这一条消息。这个厂的付厂长薛献之是资方代理人,1960年也把他拉入工会。有的干部甚至被拉下水,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这是屡见不鲜的。

#### ◇ 高薪阶层对青年的毒害

走白专道路，向资本家看齐：天津永利久大沽厂一工程师，魏X X，三口之家住一套洋房，雇用两个保姆，室内陈设讲究，全是“电气化”的，有电吸尘器，电缝纫机，落地式收音机、答录机、电视机等等，应有尽有。有了高级收音机还不过瘾，为了听立体声，在房子的不同角落另安上十几台收音机。为了在家开“菊展”，特意到北京买了一百多种菊花。暂时困难时期，嫌保姆做的菜不合味，全家三口经常到高级饭馆吃饭，一顿三、四十元。工作时间，他口含高级糖，口袋里装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政治报告不爱听了，就把“半导体”的耳塞子插在耳朵里听戏。这个魏？，生活糜烂，政治上十分反动。平时对党不满，经常散布流言蜚语，造谣惑众，勾引青年走白专道路。他对青年技术员说：“你们现在的条件不如我们那时候了，我进厂时一人一间楼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技术是从个人喜好提高起来的。”“知识就是力量。”

他经常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一些青年受他的腐蚀很大。

一位1954年中专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到厂头几年工作积极，思想进步，1958年入了团。后与魏X X接触，在他的长期潜移默化下，这位青年人迷信他的技术，羡慕他的生活方式，同其他青年说：“魏工程师技术高，生活幸福，人家已到了共产主义的标准了，多好啊！”

一位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看不惯魏的作风，以后这个魏X X经常约他到他家里去玩，这位青年逐渐变坏了。他对别人说：“魏工程师家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这位青年准备了一大笔款，打算结婚，他要向姓魏的看齐，他说什么“应该象魏工程师那样生活，否则太不象样了！”

另一个共青团员羡慕魏X X的技术，向往魏X X的生活，他竟然这样说：“魏工程师，技术好、生活舒适，我要象他那样，入不了党，当个统战人物也舒服。”

忘本负恩，向往资本主义：高薪阶层象蛀虫一样，腐蚀着每个人的灵魂，使我们的一些家庭出身很好，从小受苦的青年人，逐渐蜕化变质。

天津市一位青年女演员，家庭出身艰苦。1950年开始学戏，1957年参加剧团，头几年表现很好，1960年入了党。以后逐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资产阶级看齐，步资产阶级的后尘。1962年开始闹待遇，嫌1957年给她定的240元工资少了，她公开说：“共产党员是不是就该死，只能挣240元。”她看到“名演员”家里摆设富丽堂皇，十分羡慕，觉得自己太寒酸了。她向领导说：“人家都下高级饭馆，我就没钱去，就是去了也只能买贱菜吃，我自己都嫌难看。”当领导上和她说，共产党员应该艰苦朴素时，她很不满的说：“我入党就该死，难道非叫我和工人一样吗？”

天津市某青年演员，共青团员，从小讨过饭，干过小工。天津解放前夕，他才18岁，饿昏在城外的水坑里，快要死了被解放军发现救活的。后送他到戏曲学校学习，1954年毕业，1958年参加京剧团。头几年练功很艰苦，以后逐步变了，讲吃讲穿。1962年要离团单干，拿大钱。他向剧团提出两个条件：一要高级知识份子的烟、肉、蛋的待遇；二要工资从100元长到135元。在生活作风上极力仿效某些名演员的资产阶级那一套“风度”、“派头”，二十多岁的青年，叼着一个大烟斗，手里托着一把小茶壶，旁边摆着点心，两条腿往椅子上一搭，象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1960年暂时困难时期，到黑市买高价烟400—500盒，买十几元一斤的高价酒喝。在他这样挥霍下，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几年存下的一千多元花掉了。

另一位青年演员（1964年调查时才23岁）父亲解放前当工人，因受旧社会艰苦生活



的折磨，母亲惨死在臭水坑里，以后，父子二人过着半乞讨的生活。解放后，1958年被送到剧团学习，1962年毕业，头几年政治上要求进步，练功也很刻苦，后来在旧演员影响下，追求名利，贪图享受。每月发工资后，大吃大喝，吃中餐腻了就去吃西餐，钱不够花就跟他父亲要。他父亲到剧团去看他，他嫌父亲衣着不好，就不让他进去坐。他还公开宣布，他的奋斗目标二十年赶上厉慧良（演武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月工资要增加到950元。

#### ◇ 高薪阶层的子女好逸恶劳

高薪阶层分子的子女，长期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生活，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恶习。有的不愿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企图继承高薪阶层老子的衣钵，步剥削阶级的后尘。请看：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一个资本家吴XX，每年四万七千多元的定息，七千六百多元的工资，他规定每天的菜钱50元，保姆发愁没法花。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就不想去。他的三儿媳原是厂里的工人，嫁到他家里就不工作了。

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程师的儿子，留苏回国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他怕苦，装病在家玩了一年多。

天津永利久大沽职工医院院长，三口之家，顾用两个保姆。他儿子分配到山西榆次县某厂当技术员，月工资56元，一个人花还不够用，每月还从家里要50元。

有个资本家的十一个子女中：四个右派，三个坏分子，四个小偷。

人民公敌刘少奇所一手炮制的“高薪制”，已经生成了严重的恶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刘少奇！砸烂高薪制！确保我国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原XX市人委《革命造反派》人事局《卫东》战斗队，原市人委人事局《小学生》战斗队

※ ※ ※ ※ ※ ※

#### 高干子女的特权思想与资本主义复辟

• 向东辉 •

#### 代序

高干子女有很多是好的，比较好的，在群众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不做阶级分析，不把事情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

## ——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 前言

“对联”、“自来红”、反动血统论这股反动思潮曾在中学大肆泛滥，流毒全国，把许多中学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入冷冷清清的境地，几乎扼杀了许多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但是，同志们是否发现，各个学校受反动血统论的影响程度很不一样。请看，在南京，反动血统论贯彻最甚的学校是：南师附中、宁海中学、九中、十三中……，在北京是八一学校，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一零一中……，这些学校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干子女多！看北京，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帮凶西、东、海纠是以高干子女为骨干的，臭名昭著的反动组织“联动”也是以高干子女为主力的。与此同时，在一些高干子女少的学校里，反动血统论却不能如此放肆地泛滥，而抵制这股逆流的左派中坚就是工农子女。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老实说，就是很大的一部份高干子女最“热衷”，最“积极”，最富有创造性地贯彻推行了反动血统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也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规律，为什么这一部份高干子女特别热衷于反动血统论呢？可以一言以蔽之，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触动了刘邓及刘邓路线带给这部份高干子女的既得利益——特权，而反动血统论恰好又迎合了这些高干子女灵魂深处的“私”字——为保卫这种特权而战！

次序里陈伯达同志的话，就是我们对高干子女的基本分析、基本估价。我们不可忽视其主流方面的东西，也不可将其非主流方面的东西看成主流方面的东西。高干子女中有的人“甚至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这是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已把这方面迫切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 ◇ 高干子女与特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主席又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高干子女生长在革命家庭，从小受到革命前辈无产阶级思想的熏陶，在社会上又受到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具有一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即朴素的阶级感情），是要革命的。

但是，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在激烈地争夺下一代，我们决不能被某些表面现象迷住眼睛，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高干子女所处的经济地位如何呢？他们的经济地位是很高的，生活条件远远超过了工农劳动群众及其子弟。他们从小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过着优裕的世外桃源的生活。他们不能吃苦耐劳，不适应艰苦的生活。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确实如此，高干子女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在思想上与工农群众有了很大距离。

如此高的经济地位，对于只有一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的人来说是一颗威力很强的糖衣炮弹，在一定的情况下，它甚至完全可以决定极小部份高干子女对待革命的来自无产阶级反面的态度。

高干子女在政治上尤为特殊。

由于他们出身的关系，他们可以进入所谓“干部子女小学”（典型的修正主义学校），或其他具有种种特权的学校。他们进出都有小轿车或专车接送，听到的是一片颂扬声，得到的教育就是“将来当总理、元帅、部长”而决“不能去种地、做工、卖酱油醋。”既与世隔绝，又凌驾于世，样样与众不同，幼小的心灵里早已埋下了“非凡的，自视高贵”的种子。在那样的学校里，不少人以自己的出身炫耀，互相比父母的“官”职。从那样的小学出来，然后稳稳当当地上中学和大学。在这样的学校里，很容易入团入党。由于出身高贵，教师、校长也乐得巴结，许多人就以本校本班高干子女多而觉得光彩，这愈发使他们自视高贵的心理得到滋长。他们还有着其他许多特权，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文件，可以看内部电影（多半都是一些色情的、颓废的），常有小道消息，甚至可以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这一切都与众不同。由于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他们看得很了不起，他们往往也因此而产生“血统高贵”的思想。

必须指出，他们所处的这种地位并不一定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也不一定是他们的父母硬要给他们的，这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强加于他们的。但是他们客观上处于这种地位，而这种地位必然要对他们的思想起很大的作用。

毛主席告诉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毛主席又告诉我们，人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人生活在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在阶级斗争尖锐、曲折、复杂的社会中，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正在时时刻刻、千方百计地用“私”字腐蚀群众，征服人心。按照这个规律，一些高干子女由于生活上，政治上长期的特殊化，就会形成“血统高贵，贵族自居，特权有理”的思想。长期政治上的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生活上的优裕，就会形成政治思想上的满足和怕苦，害怕艰苦的思想改造，追求更加特殊化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这些就是高干子女身上非无产阶级烙印的集中表现和特征，归结到一点，就是由其特殊地位所决定的“私”字。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由于资产阶级分配制度，法权残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帝国主义存在的这个外部条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新形式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以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主要力量所形成的新资产阶级对广大人民实行新式的剥削与压迫，引起了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人会形成一个与人民利益尖锐冲突的特权阶层。

由于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更重要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打着“红旗”反红旗地推行修正主义，使很大一部份高干子女不能接受群众斗争风雨的洗礼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接受毛泽东思想，而往往会接受特权思想等等修正主义思想以至成为修正主义接班人，形成新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或新兴资产阶级的幼芽。

这种新兴资产阶级，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分子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优良的社会基础。

## ◇ 高干子女与反动血统论

高干子女由其特殊地位而决定的非无产阶级烙印，势必会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表现出来。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这一烙印便尖锐集中地爆发出来了。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能地感到自己末日的到来，他们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方百计地要扑灭群众斗争的烈火，达到保护自己，保反动势力的目的。这些反动家伙，以其特有的敏感，看中了高干子女的弱点，他们伸出了黑手，要利用高干子女来替他们镇压文化大革命，他们炮制了反动血统论，利用高干子女抛出去。……

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货色呢？其实质是利用特权思想来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群众，来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资产阶级的旧制度。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本质就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一个字“保”，或者说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而这种希望就会变为复辟的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会料到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第二十五页）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造反的，它是生气勃勃的，最先进的。反动血统论的本质就是一个“保”字，因此是落后的、垂死的东西。

“反动血统论”最大的市场在哪里？就在一些高干子女那里，正是他们最热心地鼓吹与推广这种路线。

为什么很大一部份高干子女这么愿意接受反动血统论呢。从客观上讲，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他们长期进行修正主义教育的结果。从主观上讲，所谓“自来红”正迎合这一部份高干子女灵魂深处的私字。

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阶级，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尚且如此，社会主义社会里又何尝不如此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它在开始的时候，就已从根本上动摇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特权阶层，剥削阶级统治。而“自来红”思想，反动血统论正是在宣扬“特权有理”，宣扬“资产阶级专政有理”，宣扬“不要思想改造”，来保住他们的特权，保住带给他们这种特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地位，使他们本能地不理解、敌视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高干子女贪污腐化，损公肥私，抄家归己，挥霍人民财产，破坏公共财产，不把毛泽东思想放在眼里，不重视思想改造，专横跋扈，压制群众等等表现，即得到证明。不少高干子女认为“反动血统论”很合胃口，便捧住不放，爱若至宝了。马克思教导我们：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恨，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毛泽东思想的反对派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仇恨心，极少数高干子女就成了资产阶

级可怜的铁杆卫道士。

高干子女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烙印就是反动血统论大肆泛滥的思想根源。而过去在彭真反动路线的统治下，工农子弟和部份干部子女受压抑的情况和文化革命初期工农革干子弟起而大造其反的情况便是这条反动路线大肆泛滥的时代背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动下，这条反动路线便泛滥成灾了。

“保”，这就是反动血统论的实质，就是反动血统论的全部内容。

而那些未能改造好的高干子女在运动中大保特保的表现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现在，这是这些高干子女破私立公触及灵魂的时刻了！

#### ◇ 高干子女的特权思想与资本主义复辟

稍微注意一下上便可以看出来，那些高干子女多的学校，都是过去的“重点”学校，质量“高”的学校，如南师附中、宁海中学、九中等等。为什么重点学校里云集高干子女呢？

什么“重点”学校，什么质量“高”，说穿了，就是升学率高。比起别的学校来，它的修正主义毒素要更多些，给学生灌输的资产阶级货色也更多些。但为什么大家都拼命投考这种学校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剥削阶级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思想还在泛滥，腐蚀我们的群众，也腐蚀着我们的干部。

大家都想进“重点”学校，可“重点”学校里所多的就是高干、高知子女。高知子女从小在家受到“唯有读书高”思想的影响，会啃书。他们凭借自己的所谓“优良”成绩和彭真的阶级路线被修正主义学校选中了。学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了从党、政、军上层中寻求他们的代理人和保护人，往往对高干子女百般庇护和怂恿，企图通过他们来谋求与其父母的某种特殊联系，因此对他们一般是不排挤的，有的甚至可以营私舞弊，通过开后门等不正当的方法吸收他们。

在这些学校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究竟选择谁来做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呢？他们所注重的，就是某些出身不好的人和某些高干子女。

有人说，在修正主义统治下的学校都排斥打击工农革干子女，这话是不完全确切的。那样的学校主要打击排斥的还是工农子女。从招生、考试、升留级这一系列制度都是大力排斥工农子女的。有多少工农子女无法迈进“重点”学校的大门！这只要看这些“重点”学校，到底有几个工农子女，而高干子女的百分比又是多少。修正主义学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大肆鼓吹彭真的“重在表现政策”，使某些出身不好的人不是真正进行思想改造，只是一心想往上爬，走白专道路。他们就想通过这条途径，培养大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种手段比较露骨的。近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把这一套打得稀巴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通过这条路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指望不大了，他们就把更大的赌注和希望寄托在利用一些高干子女形成新的特权阶层，使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化变质上面。

尤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高干子女，如前所述，从小就产生了特权思想，加上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居心险恶地抓住他们的弱点，利用“自来红”，利用反动血统论进行蛊惑，更使他们产生“贵族自居，血统高贵、特权有理”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不学毛选，不改造思想，蜕化为修正主义分子，成为一小撮骑在广大革命群众头上的“精神贵族”，忠实地充当了刘、邓反动路线的打手，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在目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把更多的复辟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些高干子女的特权思想便成为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了。因为这些人出身好，父母的职位又高，更易迷惑人，更容易在红旗的掩护下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比起培养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做修正主义苗子来，这种做法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危险性和可能性。

必须明确指出：反动血统论以及由此而产生发展的一系列反动理论的要害问题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搞资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

反动血统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泛滥，正是作为镇压革命、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刘、邓用的。表面上它大长“红五类”子女的志气，为无产阶级夺权，实质上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为修正主义夺权。你不相信吗？请看文化大革命中的现实吧。在学校里，凡是高干子女凭借“反动血统论”专权的，都实行了白色恐怖，压制了一大批革命群众，把中学里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就是在小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帮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如果一旦他们掌了权，在大范围里，岂不就是实行更大规模的资产阶级专政了吗？长此以往，资本主义复辟的实现将不用很长时间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且提出了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不按这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而是高干子女靠“反动血统论”专权，那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颜色。其根本原因在于“反动血统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靠这个起家只可能是亡党、亡军、亡国。元旦社论说得很清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放手发动群众，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革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要压制群众，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保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旧秩序。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和“自来红”“反动血统论”之类东西的斗争，也就是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它是关系到“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方向和前途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么中国就要变颜色，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

毛主席早就英明地指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也正是因为形成了一个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特权阶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扫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难道还不把反毛泽东思想的特权阶层砸个稀巴烂吗？

同共产主义革命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修正主义一样，特权阶层的出现也绝不是偶然的。对高干子女说来，如果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那就会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保自己的既得利益——特权，保爹保妈，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免得自己变“混蛋”而永远以“血统高贵”者自诩。一句话，就是私字当头，变成老保，不敢造反或至多在学校里造反，待到造反触及到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及其特权阶层的时候，就又变得保守起来，自己不敢革命，还用反动对联，反动血统论阻挠别人革命，把同学打成“反革命”“混蛋”，甚至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关。

然而革命潮流毕竟是不可阻挡的。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

的批判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一些没有教育好的高干子女也就自然会抵制批判，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大骂“右派翻天”，“崽子翻案”等等。如不好好学习老三篇，丢掉私心杂念，丢掉反动血统论，放下臭架子，坚决站到毛主席这边，则必然滑到同党对立的地步上去，北京极个别的高干子女变为反革命分子便是先例。这也说明了任何人都必须时刻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好好改造思想，决没有什么“自来红”。

某些高干子女的家长，“太过份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像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摘自江青同志4月12日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

写到达里，我们想起十四年前，总理对一些干部子女语重心长的谈话。总理特别提出了满清八旗子弟的教训，来教育这些干部子女。

八旗军是大清帝国统治政权的基本力量。

可是待全中国统一于清室之后，八旗子弟堕落下去了，荒淫无度，迷财腐化，靠种族血统的高贵；攀官坐府、横道蛮世为所欲为，使得八旗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正如史册上所记载的：“胤祯时代八旗兵丁已成赌搏、进戏园、酒馆、斗鸡、斗鹌鹑蟋蟀，雇人当差，放印子银两，典卖钱粮田地房产的游荡子和破落户，既不能自谋生计，又不能骑射当兵。”“终究兵虚马弱，器械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等件，钝敝朽坏……春秋两操，视同儿戏。将不知阵势分合奇正，兵不知战斗坐立进退。”终于被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所淹没。

历史上这类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今天，社会大变了，阶级关系大变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组织形式彻底灭亡了，颠倒的历史被人民革命的洪流反转了过来。但是，这种反动的封建地主的血统论，却一直被那些反动的封建遗老以及资产阶级抱住不放，一旦风吹草动，他们就抛出这具僵尸来麻醉青年，将他们拉入反革命的泥坑。“联动”就是他们的典型殉葬品，而“联动”的骨干分子恰恰就是高干子女。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看看今天那些正在堕落的高干子女，联想到昨天的“八旗军”及其子弟，每一个有革命志气的高干子女和革命同志，难道不应追忆十四年前总理的亲切教导，以满清八旗军子弟的衰落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吗？

#### ◇ 跋

早在几年前，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了：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这就是对高干子女特权思想的最权威的批判。

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未必如此。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青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

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些低薪阶层比较起来，更感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就不如非干部子弟。

毛主席告诉我们：“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只有在群众斗争的大风浪中锻炼，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必须指出，高干子女中有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想当初，“自来红”反动对联，谭立夫“讲话”泛滥全国的时候，就有一些高干子女勇敢地站出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抵制了这股反动思潮。今天，更有大批的高干子女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他们和革命派一起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他们中有的甚至是革命造反派的先锋与领导。同时我们深信，绝大多数的高干子女迟早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争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一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历史问题。

伟大的群众运动迅速涤荡着一切旧时代的污泥浊秽，它也必将最终消灭特权思想——复辟资本主义的是“理想”的温床。

□ 原载首都八一学校东方红公社主办《春雷》“砸烂干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联动’思潮专刊”续编，1967年12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